

中國對生育率下降的憂慮

李贊恩 (Zane Li) 九歲時迎來了一個妹妹，她的到來讓這個在中國東部小城市生活的家庭陷入了沉重的債務。

根據當時中國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李的父母因生第二個孩子被罰款 10 萬元人民幣（約 13,900 美元）——這幾乎是他們在當地市場賣魚年收入的三倍。

「我們當時勉強維持生計，」李回憶道。當時還只是三年級的孩子，卻被迫一夜之間長大，承擔了大部分家務，並在學校假期裡幫媽媽打理攤位。

現年 25 歲的李先生表示，他沒有生孩子的計劃——這種想法在他這一代人中越來越普遍，也讓中國政府感到擔憂，因為中國政府正試圖避免自身造成的人口危機。

幾十年來，官員們透過高額罰款、強制墮胎和絕育等手段向夫婦施壓，要求他們少生孩子，但現在卻懇求李文亮這一代人多生孩子。

日前，為提高持續下滑的生育率，中國宣布將為每名三歲以下兒童的父母每年提供 3,600 元人民幣（500 美元）的補貼，該補貼將追溯至 2025 年 1 月 1 日生效。

但對許多像李這樣的年輕人來說，這個提議並不理想。

「養育一個孩子的成本龐大，每年 3,600 元只是九牛一毛，」李女士說道，她透過學生貸款在北京攻讀衛生服務碩士學位。

北京育娃人口研究所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在中國，撫養一個孩子到 18 歲的平均成本為 538,000 元人民幣（75,000 美元），是其人均 GDP 的六倍多，使其成為世界上生育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

在上海，費用飆升至 100 多萬元人民幣，北京緊隨其後，為 93.6 萬元

。「（生孩子）只會帶來更多困難。我不是資本家甚麼的，我的孩子可能也不會過上好日子，」李先生說，他對自己的就業前景感到焦慮，並考慮攻讀博士學位。

由於中國經濟放緩和青年失業率飆升，人們對未來為人父母的前景如此黯淡，這對政府鼓勵年輕人結婚生子構成了重大障礙。

面對勞動力萎縮和人口快速老化，中國於 2016 年取消了獨生子女政策，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並在 2021 年允許生育三個孩子。但出生率持續下滑。儘管去年出生人數略有回升，但人口已連續三年下降，專家警告稱，人口下降幅度可能進一步加劇。

從罰款到補貼

新公佈的國家兒童保育補貼政策標誌著中國支持生育運動邁出了重要一步。

多年來，地方政府嘗試了一系列激勵措施，從減稅、住房補貼、現金補貼到延長產假，不一而足。如今，中央政府牽頭推行一項全國統一的計劃，預計今年將撥款 900 億元人民幣（約 125.4 億美元）用於補貼，惠及 2,000 萬個家庭。

「這不再只是地方性的實驗。這表明政府已將生育危機視為緊迫且全國性的問題，」耶魯大學人口統計學家兼社會學教授艾瑪·臧 (Emma Zang) 表示。「傳遞的信息很明確：我們不僅僅是告訴你要生孩子，我們終於要拿出一些錢來。」

這項新計畫也為 2025 年之前出生的三歲以下兒童提供部分補貼，受到了符合資格的家長的歡迎，但臧女士表示，該計畫不太可能對生育率產生影響。

她補充說，在日本和韓國等其他東亞國家，類似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提高生育率。

對於許多正在努力應對高昂的房價、漫長的工作時間和不穩定的就業市場的中國年輕人來說，補貼根本無法解決他們不願意成家的深層焦慮。

「這真的不僅僅是成本問題。很多年輕人對未來心存疑慮，例如工作保障、父母年邁、社會壓力等等，所以現金補助並不能解決人們如今面臨的情感疲勞，」臧說。從對未經批准生育的父母罰款到補貼他們生育更多孩子的轉變，其諷刺意味在中國千禧世代和 Z 世代中並不鮮見，尤其是那些親眼目睹了獨生子女政策 嚴厲懲罰的人。

在中國社群媒體上，一些用戶發布了舊收據的照片，上面顯示了他們的父母因生下他們或他們的兄弟姐妹而支付的罰款。

高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在貴州偏遠山區長大，並要求只透露她的姓氏。貴州是中國最貧窮的省份之一，也是 獨生子女政策下眾多獲得豁免的地區之一。根據中國重男輕女的傳統，如果農村夫婦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孩，就可以生第二個孩子。

和她的兩個姊姊一樣，高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去和祖母一起生活，以躲避計劃生育官員的追捕，這樣她的父母就可以繼續努力生個男孩。他們生了四個女兒，最後才有了一個兒子。

現年 27 歲的高女士現居中國東部省份江蘇，她表示自己對結婚或養育孩子沒有興趣。

「我知道我無法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和生活環境，所以選擇不生孩子也是一種善舉，」她說。「我絕對不希望我的孩子長大後像我一樣……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只能像我一樣在社會底層掙扎。」

樂觀情緒消退

幾十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和生活水準的提高，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相信自己會過著比父母更好的生活。

如今，這種樂觀情緒正在消退。如今，許多年輕人曾經被灌輸透過努力工作和接受教育就能獲得向上流動的希望，但他們的幻想卻越來越破滅：房價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承受能力，大學學位也不再能保證找到好工作——人們夢寐以求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多地落到了那些有家庭關係的人手中。

人們越來越感到徒勞，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中，他們的不懈努力只能帶來越來越少的回報——這種趨勢可以用一個流行的流行詞「內捲化」來概括，這個術語借用自社會學，用來描述過度競爭導致的自我毀滅的惡性循環。

作為回應，許多人選擇「平躺」——這是另一個流行語，指的是選擇不去滿足社會期望，包括婚姻和養育孩子。

29 歲的趙瓊 (June Zhao) 在中國最「複雜」的地區之一——北京海澱區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長大。

海澱區人口 300 萬，擁有多所全國頂尖大學，但同樣以其極為激烈的育兒競爭而聞名。趙女士從三年級開始每個週末都要去上補習班，而她的學業成績已經比同齡人落後了好幾年。

在海外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學位後，趙女士回到北京從事投資者關係工作。她說，從小到大承受的巨大壓力——至今仍能感受到——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她決定不生孩子。

「成本實在太高，回報太低，」

她說。「總的來說，我對生活比較悲觀——我付出了那麼多，卻收穫甚微。」

趙女士認為自己很幸運——她的工作很少需要加班。即便如此，她也很難想像自己能抽出時間照顧孩子。每天上下班和吃完晚餐後，她只有兩三個小時的空閒時間才能睡覺。她說，對於那些每週工作六天、每天早 9 點到晚 9 點、被困在「996」工作制度中的朋友來說，情況會更加艱難。

和許多同儕一樣，高女士對自己能為孩子提供的生活，以及孩子出生的社會環境，都感到十分不樂觀。「只有當你相信未來會很好的時候，才會有想要生孩子的衝動，」她說。

此外，還有長期存在的育兒性別失衡問題，以及由此對女性造成的身心壓力。就趙女士而言，她的母親不得不兼顧全職工作和輔導她做作業，或者陪她去輔導班。

「我親眼目睹了母親養育我有多不容易。我清楚地知道，女性在養育方面承擔的負擔和成本比男性要重得多。」

隨著生育率下降，執政的共產黨強調女性在家庭中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稱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組成部分，對「下一代的健康成長」至關重要。官員勸告女性樹立「正確的婚姻觀、生育觀和家庭觀」。

人口統計學家臧先生表示，如果不解決女性面臨的實際障礙，就指望她們生育更多孩子是不切實際的。

「你不能讓時光倒流，指望女性只會接受更傳統的角色。如今的年輕女性受過高等教育，以事業為導向，渴望更多的平等。除非政策透過陪產假、工作場所保護和彈性工作等措施來支持這一現實，否則生育率不會反彈，」她說。

「政府想要更多孩子，但社會結構並不支持家庭，」她補充道。「現在，養育孩子看起來像個陷阱，尤其是對女性而言。除非這種情況有所改變，否則補貼是不夠的。」(CNN)

政府對中國千禧世代不願結婚感到擔憂

兩年前，蘇喬安妮對即將年滿 30 歲感到焦慮。

她在中國南方大都市廣州的一家外貿公司工作，收入不錯，週末可以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但對蘇和她的父母來說，有一個問題——她是單身。

「那時候，我覺得 30 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門檻。當它越來越近時，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要找到合適的結婚對象——既來自父母，也來自我自己，」她說。

蘇如今 31 歲，仍然單身，但她表示自己不再擔心了。「和一個不喜歡的人湊合著過，過幾年就離婚，這有什麼意義呢？純粹是浪費時間，」她說。

蘇女士是越來越多推遲或完全放棄結婚的中國千禧世代之一。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短短六年時間裡，中國初婚人數急劇下降，從 2013 年的 2,380 萬下降到 2019 年的 1,390 萬，降幅達 41 %。

中國官員和社會學家認為，結婚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數十年來中國實施的限制人口成長政策，這意味著中國可供結婚的年輕人數量減少。但專家表示，這也與人們對婚姻的態度轉變有關，尤其是年輕女性，有些人對婚姻制度加劇性別不平等感到失望。

中國女權運動領袖尚美麗說，在極端情況下，有些人甚至在社交媒體上辱罵妻子，稱她們是「嫁雞」，這是一個貶義詞，用來形容婚姻中順從父權規則的女性。

「這種人身攻擊是錯誤的，但它表明很多人對婚姻懷有強烈的恐懼。他們希望所有女性都能意識到婚姻對個人和女性整體來說都是一個不公平的製度，從而遠離它，」尚說，她曾徒步 2000 公里（1200 英里），呼籲中國改革兒童性虐待法律。

結婚率下降是北京面臨的問題。

讓年輕人生育孩子是中國 避免人口危機的關鍵，人口危機可能嚴重影響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穩定，並可能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構成威脅。

「婚姻和生育息息相關。結婚率下降會影響生育率，進而影響經濟社會發展，」民政部官員楊宗濤在去年的記者會上表示。

他說：“這個問題應該被擺到首要位置”，並補充說，該部將“完善相關社會政策，加大宣傳力度，引導公眾樹立積極的愛情、婚姻和家庭價值觀”。

令人震驚的統計數據

民政部數據顯示，2019 年，中國結婚率連續第六年下降，每千人僅 6.6 對，較 2013 年下降 33%，為 14 年來的最低水準。

中國官員將這一下降歸咎於適婚年齡人口數量的下降，這是 1979 年為控制中國人口而實施的戰略——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

但人口統計學家多年來一直在警告人口危機即將來臨。2014 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 30 多年來首次萎縮，令中國領導人感到擔憂。

隔年，中國政府宣布結束獨生子女政策，允許夫婦生育兩個孩子。該政策於 2016 年 1 月 1 日生效，但結婚率和生育率仍下降。2016 年至 2019 年間，出生率從每千人 13 人下降到 10 人——女性的解放和千禧世代價值觀的改變，對這一趨勢更是雪上加霜。

婚姻率下降並非中國獨有。過去幾十年來，全球結婚率都在下降，尤其是在較富裕的西方國家。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亞洲社會婚姻與

家庭議題的社會學家楊偉俊表示，與日本、韓國、香港和台灣等其他東亞社會相比，中國的結婚率仍然最高。

但沒有其他國家像中國一樣，透過獨生子女政策來對人口進行社會工程。

楊說，這項政策也在其他方面影響了婚姻。中國家庭重男輕女的傳統導致出生性別比失衡，尤其是在農村地區。目前，中國男性過剩人口超過 3000 萬，他們將面臨尋找新娘的困難。

社會經濟變革

人口結構變化本身並不能解釋中國結婚率的急劇下降。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經濟也更獨立。

1990 年代，中國政府加速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讓貧困地區的女童有機會走進教室。1999 年，政府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提高大學入學人數。到 2016 年，高等教育中的女性人數已超過男性，佔大學生總數的 52.5%，佔研究生總數的 50.6%。

「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獲得了經濟獨立，所以婚姻對女性來說不再像過去那樣是必需品，」楊說。「現在的女性希望在結婚前追求自我發展和事業發展。」然而，性別規範和父權傳統並未跟上這些變化。在中國，許多男性和公婆仍然期望女性在婚後承擔大部分的育兒和家務，即使她們有全職工作。

「婚姻太難了。這不僅僅是嫁給一個人，還要娶公婆，照顧孩子——婚姻會帶來很多責任，」楊說。

同時，針對女性的就業歧視現象普遍存在，導致女性難以兼顧事業和孩子。

「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開始思考：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對我有什麼好處？」研究家庭問題的上海紐約大學心理學助理教授李璇說。「（性別不平等）確實讓中國年輕女性在步入婚姻殿堂前猶豫不決。」

李說，更糟的是，長時間的艱苦工作和高壓力使得年輕人幾乎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建立人際關係和維持家庭生活。

統計顯示，男女雙方的結婚年齡都在延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數據顯示，從 1990 年到 2016 年，華裔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從 22 歲上升到 25 歲，男性則從 24 歲上升到 27 歲。

大城市的數字甚至更高。例如，2015 年上海男性初婚平均年齡為 30 歲，女性為 28 歲。

來自廣州的 31 歲蘇女士經常聽到已婚朋友談論婚姻生活帶來的負擔。

「現在女性經濟能力提高了，一個人住其實挺好的。如果找個男人結婚生子，壓力就大很多，生活品質也會下降，」她說。

女性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也使得婚姻市場上處於對立面的兩類群體——高學歷、高收入的女性和低學歷、低收入的男性——更難找到合適的伴侶。

楊說：「傳統上，中國女性希望『嫁得高』——也就是說嫁給學歷和收入都比自己高的人——而男性則希望『嫁得低』。」儘管女性的學歷和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這種偏好基本上保持不變。

轉變價值觀

人們對愛情和婚姻的價值觀也改變了——自現代中國成立以來，這種變化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毛澤東時代，婚姻不是個人選擇，」新南威爾斯大學中國婚姻問題專家王攀說。「大躍進」時期，執政的共產黨鼓勵人們盡可能多生孩子，因為國家需要勞動力來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因此，婚姻在社會主義和國家建設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她說。

1950 年，中國通過了《新婚姻法》，禁止包辦婚姻和納妾，並允許婦女與丈夫離婚。但潘說，在實踐中，包辦婚姻仍然普遍存在，婚姻和離婚自由的字眼並沒有轉化為愛情的自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你談論愛情時，它被視為資本主義的東西，是人們需要與之鬥爭的東西，」她說。

從那時起，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改革開放後，千禧世代比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享有更多的自由，他們不再將婚姻制度視為義務，而是一種個人選擇。

社會對同居和婚前性行為的接受度不斷提高，加上避孕和墮胎措施的普及，使得年輕人能夠在婚姻合法制度之外享受戀愛關係。他們將婚姻視為情感連結的表達，而不僅僅是生育的手段。

32 歲的童星 (Star Tong) 過去認為，女孩到了 25 歲左右，戀愛、結婚、生子就該是理所當然的事了。由於擔心單身，25 歲以後，她參加了大約 10 次相親，大多是父母安排的。

但她們都沒有成功——童堅持要找一個和她有共同價值觀和興趣的伴侶，並且拒絕僅僅為了結婚而將就某人。

「現在我意識到結婚並不是唯一的選擇，」她說，「獨自一人也完全沒問題——我很開心，有很多朋友，可以集中精力發展我的事業，照顧好自己和父母。」

童說，她看到社會對單身女性態度的轉變，感到很受鼓舞。

2007 年，官方支持的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使用「剩女」來形容 27 歲以上的未婚女性。同年晚些時候，教育部甚至將這個詞納入官方詞彙，進一步推廣了它的使用。

自此以後，該詞頻頻登上頭條新聞，並主導了網路討論，常被用來批評那些在尋找伴侶時「過於挑剔」的高學歷女性。近年來，該詞引發了女性主義者和學者的批評。2017 年，全國婦聯的旗艦報紙《人民日報》宣布將不再在報道上使用該歧視詞彙。

每逢佳節團圓，親戚常常叮嚀找對象不要「太挑剔」。「我以前覺得『挑剔』是個貶義詞，」她說，「但現在，我覺得我應該自己選擇，選擇自己想要的，這沒什麼錯。」

成本上升

接下來是成本問題。

對許多中國家庭來說，買房子是結婚的先決條件。但許多年輕夫婦根本無力支付昂貴的房產費用——而且並非每個父母都有足夠的儲蓄來幫助他們。

上海紐約大學心理學家李璇表示，儘管買房並非人人都想，但中國的社會福利體系使得擁有住房對於希望為孩子創造更美好未來的夫婦來說幾乎成了至關重要的事情。

例如，在好學校附近擁有一棟房子可以讓他們的子女接受高品質的教育，富裕的夫婦往往願意為這些令人垂涎的房產支付高價。

來自西南城市成都的 24 歲學生 Joanna Wang 與男友交往三年。這對大學戀人計劃在她從香港碩士畢業後一起在上海生活，但目前還沒有

結婚的計劃。

「結婚什麼的都要花錢，但我賺的錢不可能比花這些錢還多，」她說。

經濟壓力不僅存在於城市。在農村地區，男性家庭必須向女方家庭支付「聘金」——通常是一大筆現金或一棟房子。這種習俗在中國已存在數百年，但近幾十年來，由於性別失衡加劇，聘金成本飆升。由於獨生子女政策和快速城鎮化，農村單身漢數量過剩，許多女性被迫進城打工。

中國政府擔心

隨著人口危機迫在眉睫，中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和宣傳活動，鼓勵夫妻生育。官方媒體向夫妻宣揚，生孩子「不只是家庭事務，也是國家大事」。在城市和農村，倡導二胎的宣傳口號紛紛出現，取代了先前威脅對違反獨生子女政策者進行嚴厲懲罰的口號。

「政府希望不斷有新的孩子來，」上海紐約大學的心理學家李說。

隨著二孩政策的放開，各省政府將產假延長至國家規定的 98 天以上，最高可達 190 天。一些城市也開始向生育二孩的夫婦 提供現金補貼。

2019 年，中國橡皮圖章式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幾位代表提議將最低結婚年齡從男性 22 歲、女性 20 歲降至男女 18 歲，以鼓勵年輕夫婦早婚多育。但該提案在網路上招致了批評和嘲諷，許多人指出，導致年輕人推遲結婚的是社會和經濟壓力，而不是法定年齡限制。

同時，共青團——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承擔起了牽線搭橋的任務，舉辦大規模的相親活動，幫助單身人士找到人生伴侶。

當局不僅鼓勵年輕人結婚，也努力讓已婚夫婦團聚。

去年，中國國家立法機構為申請離婚的夫妻引入了 30 天的“冷靜期”，並於今年生效。這項新法律在網路上引發了批評，尤其是女性群體，她們擔心這將使 離婚變得更加困難，尤其是對家庭暴力受害者而言。

但到目前為止，這些政策似乎都沒有扭轉結婚率下降的趨勢。

專家認為，問題很大一部分在於，沒有任何一項政策可以解決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問題，這種不平等阻礙了年輕女性進入婚姻和家庭生活，例如傳統的性別角色和就業市場對女性的歧視。

李女士說，她注意到近年來政府宣傳中出現了更傳統的性別角色的復興。「這很大程度上與政府的計劃有關，也與政府如何將年輕男女視為社會資源有關，」她說。

如今，由於密集育兒文化盛行以及老年人口的不斷增長，對護理工作的需求非常強烈。隨著國家福利的減少，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人來承擔育兒和養老的重任，而女性是這類工作的『預設』勞動力。所以我認為這也是他們推動女性重返家庭生活的原因之一。

尚女士表示，自從獨生子女政策放寬以來，職場上對女性的歧視也加劇了，因為雇主擔心女性現在會生第二個孩子並休更多的產假。

她說，如果這些問題無法解決，國家對年輕女性結婚、維持婚姻、生孩子的壓力只會讓她們與國家更加疏遠。

「（政府）需要轉變思維，從保障婦女權益的角度鼓勵女性生育。他們不應該把女性的子宮當成水龍頭，想開就開，想關就關。」尚建軍補充道。(CNN)